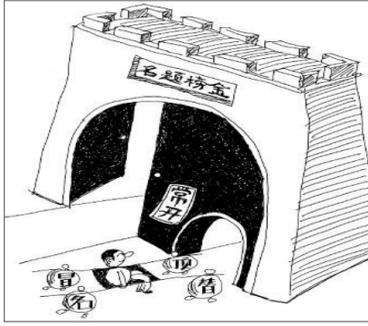


# 女子冒充他人上大学 揭入学背后漏洞

湖南邵东学生罗彩霞被当地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，一度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。冒名者父亲公安局政委的身份成了关注重点，也正是这位政委以权谋私，顺利地让女儿冒了别人的名上了大学。然而，现实总是不断超越人们想象。继罗彩霞之后，不断有新的“冒名上大学”事件发生，当事人并非位高权重，但却是轻而易举地冒了名，上了学。

山东省东明县实验中学的李景娥就是这样，冒她名上大学的程永珍是她的同班同学，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孩。她到底是怎样通过层层审查，冒名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的呢？



(均为资料图片)

## 为增加录取机会，冒名多填志愿

2005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李景娥很是失落。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她这次只考了446分，她不甘心，决定开始复读。因此，高考填报志愿那天，李景娥连学校都没有去。

同班同学程永珍成绩远比李景娥差，只考了352分。得知李景娥不打算填报志愿，她就在填写自己的志愿后，又用李景娥名字报了另一个志愿，她想“这样可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”。

“当时俺年龄都比较大，俺是1982年出生的，比他们(同一届的学生)大两岁，不想复读。即便复读，也很难考取一个好学校，就想随便上一个算了。我抱着这个想法，又得知李景娥想去复读，就‘帮’她填了志愿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她表示，自己当时也没多想，就是看见李景娥没来填志愿，随手多填了一个。

一个多月后，高校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。程永珍被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录取，而李景娥被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录取。看到李景娥被录取的学校比自己的好，程永珍就想上李景娥那个学校，反正李景娥也不会去。于是，她拉着姐姐一起去李景娥家。

可能拿了准考证，我不是很记得了。”

“然后你就注册了，正式上学了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！”

入学时，学校对每个学生是否严格审查呢？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2005年，也就是程永珍去冒名上大学这一年，学校还没有将照片挂到网上去进行核对。“报到时不需要身份证。学生只需拿一个我们的通知书和报名号就能来注册了。我们不可能拿着身份证一个个对着，看你是不是本人，我们还是通过证件号来进行注册的。又不是公安机关抓捕犯人，那才需要专门的软件进行校对。再说年轻人相貌变化大，照片上看差距不大的很难辨别出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又不是专业人士。”

该工作人员表示：“即便是现在依然这样。我们凭借证件号码和通知书来辨别身份，进行注册。”

## 毕业时发现问题，教育局要求被顶替者自己开证明

李景娥在复读了两年以后，在2007年以536分的成绩考上了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。大学四年平静如常，而程永珍也早于她3年毕业了。如果不是毕业注册时发现了问题，可能一个人的高考，就能够成就两个人的大学学历。

2011年临近毕业，李景娥所在的学院学籍科的一位老师打电话告诉她，她的毕业注册出现了问题，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被注册了。而教育部规定，户籍上的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学生在4年内不能两次注册大学毕业信息。李景娥这才想起来6年前程永珍用自己的高考成绩上大学的事情。

高中毕业后，李景娥就再没和程永珍联系过。费尽周折，李景娥终于从高中同学那里打听到程永珍的电话，跟她说了这件事。程永珍也感到很意外，她没想到会影响到李景娥大学毕业，当即表示愿意去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注销学籍和学历。

程永珍打电话给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，问

是否可以注销她的学籍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。当程永珍和李景娥两人一起去办理学籍注销时，学校提出要有高考生源地教育局的书面证明，证明程永珍确实冒李景娥之名上了大学。

她们又回到山东，但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东明县教育局都以此事“是学校的事”为由，拒绝开这个证明。两人又去了高中学校，但没有人愿意为她们开这个证明。

这下难住了两个女生。程永珍为此也感到很歉疚，她以为自己承认冒名就可以注销学籍。“这件事是我做错了，我承认还不行吗，为什么要其他人来证明？”她有些不解。

贵州省教育厅也表示，要当地教育部门给出书面证明才能注销。

眼看着自己毕不了业，李景娥急得直掉眼泪，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被人冒名。事到如今，该谁来负责，又有谁来解决呢？

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是省教育厅要求她们拿出证明来，才给她们办。她们两个无非是抓住两个人身份证的不一样，来质问我当初怎么没有发现她是假的，还让她上了学。我们怎么发现？照片确实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如何凭借这点相貌上的不一样就怀疑她，把她退学？很多人都有这样相貌的变化。如果不是有人举报，我们不可能投入大量精力去核身身份。她没能拿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证明，我们不能自己作判断说她是假的。就比如她说自己是神经病，我们也不能就相信她是神经病，除非她拿出医院的证明来。”

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，这件事确实难办，当地教育部门如果承认这个事实(冒名顶替上学)，那么就要有人承担责任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开这个证明。

山东省东明县教育局则对回复记者称：“这一起冒名顶替事件中，两个人都参与了，所以两

个人都负有责任。按道理，我们就不该帮李景娥出具这个证明。而且核实身份这件事情，那还得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。公安机关已经给她开了身份证明了。”

就在记者发稿前，李景娥来电话告知，问题已经得到解决，程永珍的学历已经被注销。记者从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籍科了解到，黑龙江省教育厅已经通过网络告知学校，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学生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李景娥毕业已不再是问题。

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关信平则对此类问题直指社会诚信：“这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老问题，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诚信体系。”

关信平说，很多时候，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特定人的利益，而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。程永珍借用李景娥的高考成绩去上了大学，如果不是毕业时出现问题，那么她看似没有损害谁的利益，实际上却是占用了她不该占用的教育资源，损害其他人的受教育权利。

## 冒名上大学背后的那些漏洞，仅靠行政处罚缺乏威慑力

自罗彩霞事件以来，陆续曝出多起冒名上大学事件，情形各不一样，有在权力运作下顶替的，有双方默许的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静村分析认为，冒名上大学事件屡有发生，说到底还是人们犯罪压力不大。“这些人不是没有法律意识，不是不知道要懂法守法，而是人们大多认为，这不像杀人抢劫偷东西那么性质恶劣。”

教育部为了制止考试舞弊，在2004年5月发布了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。然而，该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惩治考试作弊，而不是现实中也很严重的招生腐败。早在2007年，就有消息称《考试法》草案专家组组长、徐静村告诉记者，程永珍和李景娥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，但不涉及违法。目前，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升学考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，教育权被侵占该如何处置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因此，对于冒名顶替上大学这类事件，只能通过在这些事件中的其他相关的违法行为来进行惩处。

以罗彩霞事件为例，2009年10月，原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民警王峰嵘——冒名者王佳俊之父被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，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。与原犯受诈骗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实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。而其他例如招生部门、学校所受到的行政或者党纪处分仅限于留党察看，开除党籍，降级等，鲜有涉案人员被刑事处罚。

“实际上，招生、学校、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关键

关口，仅是行政处罚很难形成威慑。”徐静村认为。

## 现行录取体制提供了“便利”

采访前，记者曾设想，可能如同罗彩霞事件一样，这件“顶替事件”藏着众多权力的滥用。但现实出乎记者意料，冒名者和被冒名者都来自普通家庭，程永珍的父母务农，其姐姐也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

“像李景娥这种情况，从表面上看是出于无知，她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。但从整体来看，冒名上大学事件频频发生，根源在于目前的计划录取体制。”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认为，从高考到招生这个链条是很脆弱的。“如果一个环节能够打通，后面的环节就可以层层打通。”熊丙奇说，现在学生拿到一个通知书，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，无论你是不是顶替的，以前成绩和能力如何，都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身份的转换，进而完成命运的转变。这种现状，使得众多没有能力考取大学或者好大学的人，走上了作弊、顶替、冒名的道路。

熊丙奇说，如果设定的大学教育制度是如欧美国家的“宽进严出”，那么就不会有人争破头皮来冒名顶替了。“你即便进来了，但是你依然可能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你还面临着毕业这个坎儿。”

## 诚信缺失是根源

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关信平则对此类问题直指社会诚信：“这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老问题，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诚信体系。”

关信平说，很多时候，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特定人的利益，而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。程永珍借用李景娥的高考成绩去上了大学，如果不是毕业时出现问题，那么她看似没有损害谁的利益，实际上却是占用了她不该占用的教育资源，损害其他人的受教育权利。

就程永珍冒李景娥之名上大学一事，关信平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诚信不诚信，又缺乏对不诚信的惩戒机制的例子。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诚信，对社会不负责任，不做好信息的核对工作让冒名顶替者轻而易举地钻了漏洞；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诚信，人们在行为意识中对这个问题看得不严重，往往只看一个人的成功，却不看他是怎么成功的，不看他在成功的道路上是否有欺骗等不道德的行为。一个人太诚信却被称作太老实，不够灵活。而一个人如果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得了一些所谓的成功，却会被认为是本事。整个社会文化中，人们对这类诚信问题的评价都是扭曲的。”

去年高考前夕，教育部对广大考生进行一番提醒，明示了在高考中违规的代价——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，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。然而，关信平认为，杜绝高考舞弊现象，应该作为从教育领域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来抓。“如果仅仅对考生挥起警棍大棒，而无法在更为深广的社会领域实现对权力失范行为的规制，治理高考舞弊就很难实现成功转身。” 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## 身份证都没带，拿着通知书就去报到了

得到李景娥的默许，程永珍就带着通知书去报到了。她是怎样通过各道关口，顺利完成学生注册的呢？

“你在拿到李景娥的通知书后怎么做的呢？如何不让学校发现你的假冒身份？”记者问。

“就直接去了，也没想那么多。”程永珍回答说。“不怕被发现了？”

“发现了也不念了呗。”

“你什么准备都没有，那学校怎么没有发现？”

“他们就要了录取通知书，没有要身份证，

# 新闻时评

## 让群众骂娘 天塌不下来

7月4日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民在线交流：看到很多网民骂我，把我说得一塌糊涂，当然我也看到挺我的，这些都正常，作为公众人物，应该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。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地、虚心地去接受，不计态度、不问来历。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，群众不能发脾气呢？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，群众不能骂娘？(7月4日人民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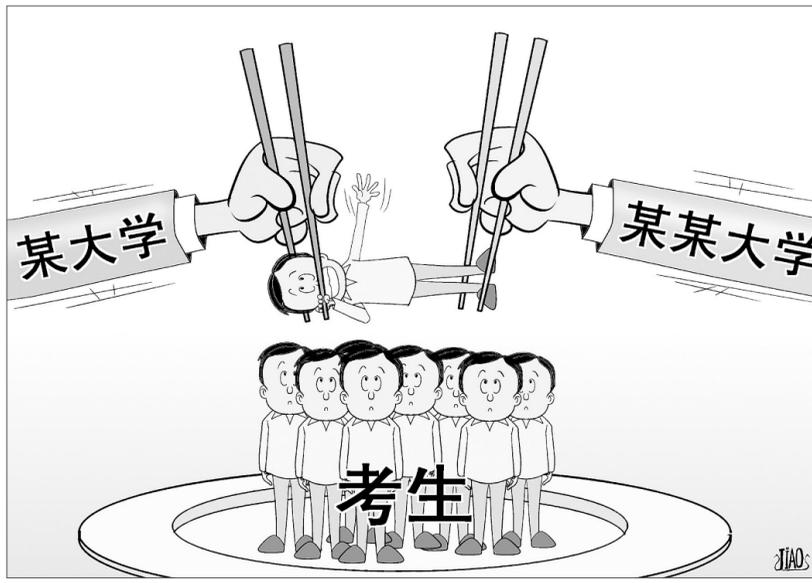
汪洋一席话，在网络世界赢得一片掌声。应该说，网络问政要允许群众骂娘，原本只是一个常识，因为：不被人骂的人几乎没有，官员亦不会例外，而嘴长在别人脸上，骂娘是别人的自由，就算官员不允许，最多也只是“别让老子听到”而已；但是，堂堂一个省委书记，能够如此平静看待自己的声音，并且将允许群众骂娘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当然权利，实在让人感到些许惊喜——遇到一个可以骂的省委书记，在我们的语境里实属新鲜。

反过来想一想，一个官员不允许群众骂他，对骂他的人不惜以诽谤罪拘捕之，只能说明此类官员霸道，毫无包容之心和极端不自信。相应的，一个官员能够笑对群众之骂，首先要有平等观念，再要有包容胸襟，然后还要非常自信。若非如此，必然会做出各种霸道举动来。

事实上，只要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官员，而不是一个特权官僚主义者，必然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朴素道理，知道群众的骂也是一种诉求表达，同样是值得为官者关注和体恤的。如果骂得有理，那么就虚心接受，努力改善；如果骂得无理，那么就澄清解释，开诚布公。所以，成熟的现代政府控告传媒或者公民十分少见，更别说动辄建立黑名单、进京抓记者、动辄“跨省”抓捕网民了。某种意义上，让骂你的人某一天不再骂你，改而挺你赞你，实乃为官者最大政绩追求之一。

放眼媒体上的国际报道，群众当面骂官员的新闻简直多如牛毛。比如日本赛后，首相去灾区看望灾民，感激涕零者鲜有，大多数都是冷漠置之、破口大骂者也很多。首相显然对此早有心理预期，并不感到任何诧异，而是照旧鞠躬如仪。任何成熟的公仆，而不是霸权的官僚，都应该有这样的素质；或者说，作为公众人物，拥有官民平等的观念和忍受被骂的胸襟，未尝不是现代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。

一方面，领导可以发脾气，群众当然也可以发脾气，领导可以骂娘，群众当然也可以骂娘；另一方面，官员接受群众监督是应有之义，而骂娘其实也是一种监督方式，欢迎群众监督就不能选择性地屏蔽脏骂娘的部分。一言以蔽之，“允许群众骂娘”是成熟公仆应有品性，我们期待能够遇到更多可以骂的官员。 盛翔



## 大学校长不应沉迷这“哥”那“叔”

“姐的狂放”，“哥的犀利”，“让子弹飞”，“童鞋们”，“有木有”，“泪牛满面”……如果说这些网络热词成了“潮语”，那么，几所大学校长在开学(毕业)典礼上对这些“潮语”的运用，也起了广告之作用。

自去年“根叔”串烧网络热词给学生讲话受到追捧后，舆论因此而热闹。叫好的说：大学校长摒弃“官话”讲“人话”，这是转变校风的标志。质疑的也有，曾于1980年代担任过大学校长的刘道玉说：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，原来那套，入骨生硬，官腔十足；现在这套，滥发情感，浮夸轻佻，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。今年，媒体上又增添了“晚红哥”、“风哥”、“纪宝宝”等校长“艺名”。对于大学校长讲潮语、唱流行歌，网络上依然众说纷纭；校长“秀才艺”，不能过头；作为校长，应该讲激励学生的话，一味说好话无用；“叔啊哥啊”装嫩，影响并不好……那么，大学校长到底应该如何讲话？谈请几位名校长作证。

1916年，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，他的上任演说讲的是“大学学生，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”；1958年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若在开学典礼上致辞，主题为“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，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”；蒋南翔20世纪60年代主政清华大学，几乎对每一届毕业生都要讲：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，第一，要听话；第二，要能出活儿。清华学子、后来成为名记者的杨绛回忆说：蒋校长的话，好像父亲对儿子讲的，不像教育家讲的。

这些校长都有自己的坚守，因而各具特色，史册留名。相较而言，“根叔”走红，与大学行政色彩太浓、校长远离学生有

## 争考生

近日复旦和上海交大因争夺生源问题开始相互指责，高考生源争夺的序幕也被相继曝出。据媒体报道，7月1日复旦工院校冒充复旦老师抢生源，随后复旦相关人士爆料称这个学校就是上海交大。7月2日交大回应称有高校在造假事实，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有最新消息称此事将由主管部门解决。高校争夺生源其实无可厚非：都是想把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。但是很多学校则采取一些不光彩甚至卑劣的手段，光明正大的高考招录就变了味。

焦海洋/图

## “老好人”隐喻精神通胀的时代寓言

在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一些处事圆滑、不讲原则、到处和稀泥的“老好人”。而且这种“老好人”往往能在评优、晋升等场合胜出。近期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，对3001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，61.1%的人确认自己身边的“老好人”非常多或比较多，30.5%的人感觉一般，仅7.3%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少有“老好人”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5日)

在我们这个崇尚中庸文化的国度，“老好人”的存在拥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语境。我们有充足的理由，将之“归咎”于人情社会——情面比制度重要，关系比能力重要，“老好人”自然容易获益。但在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穷途末路的今天，“老好人”却有了更广阔的舞台，这其实隐喻着精神通胀的时代寓言。

“老好人”不一定是“坏人”，但“老好人”却一定意味着社会责任担当的淡漠，更意味着是非观念的模糊和道德原则的溃败。譬如面对内部腐败无人检举揭发，导致贪官横行十数载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、麻木不仁的“老好人”团体生态；再譬如“围观猥亵”、“不敢伸手”之类“老好人”群体作风。显而易见，从某种个体的性格品质演化成群体的生存法则，这无疑反衬出了社会性的精神泡沫和信仰缺失。

我们的精神世界曾经无比富庶。放眼历史，数千年文化的积淀，铸就了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精神风骨。从古至今，无论是王朝更迭还是战火硝烟，乃至近现代被侵略被奴役的黑色岁月，我们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呐喊，大师与巨人频出，引领整个时代。但如今，不管愿不愿意承认，我们的精神世界都有学名叫“通胀”、俗名叫空虚的征兆，越来越多的文化现象、社会现象，正在折射出这种精神的功利化与“通胀”迹象。而“老好人”现象只不过是“精神通胀”的一个现实注脚罢了。

该做的事情不想做，该做的事情不敢做，争当“老好人”——在社会领域，类似关乎精神矮化的现实注脚比比皆是。在当前这个娱乐精神攻陷一切、功利主义渗透一切的时代，我们的精神信仰缺失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救赎的程度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“老好人”的盛行让社会缺乏了内涵和活力。当前，我们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——“当我们走在大街上，陌生人保护我们，如警察；或陌生人威胁我们，如罪犯。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，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……”在陌生人社会中，失去了“人情与血脉”的联系，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，如果“遍地都是老好人”，我们又将情何以堪？ 陈一舟